

红色后代



成都出版社

红色后代

程 歌 编著

成都出版社

1996年2月

红色后代

编者：程歌
责任编辑：夏雨
封面设计：梁伟
技术设计：阿齐
责任校对：王华光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百花苑
邮政编辑：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四川省经委印刷厂
版次：1996年2月第1版
印次：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3
字数：320千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575—946—4/K·64
定价：16.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和他的少将妻子邵华 (19)

不随父母姓的亲生女儿

——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27)

讷于言的“红色公主”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 (34)

失而复得的女儿

——毛泽东的长女杨月花 (43)

流淌在心底的爱

——毛泽东的长媳刘思齐 (49)

血脉总相连

——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 (57)

宦海沉浮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64)

与众不同的人生路	
——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	(70)
心系残疾人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82)
自称“政协委员”的画家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	(98)
为父亲作传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	(106)
人民的儿子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	(112)
平平的道路不平坦	
——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	(121)
国家主席的子女们	
——刘少奇子女的今昔	(132)
做一个普通人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	(140)
草原上的北京姑娘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健	(146)
从军队的女儿到电视名导演	
——周恩来的侄媳邓在军	(152)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朱德的儿子朱琦	(161)
艰难的履程	
——朱德的女儿朱敏	(168)

彭总遗风犹存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彭钢 (176)

政界务实者

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 (188)

历经磨难 一身正气

——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及女婿邹家华 (196)

帅府小花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204)

世界第一女中将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 (213)

沧桑历尽显豪情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 (226)

虎门英才

——贺龙的儿子贺鹏飞 (236)

儒将骄儿

——陈毅的儿子陈昊苏、陈晓鲁 (242)

寻常人生

——罗荣桓的子女们 (248)

希冀

——许世友的儿女们 (258)

迎接挑战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来 (266)

情韵悠悠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 (269)

- 延安的“大女儿”
——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 (278)
- 他从基层走来
——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及其妻子彭丽媛 (284)
- 他有两位父亲
——胡耀邦的儿子刘湖 (290)
- 以实做事 以诚待人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296)
- 海阔天空任翱翔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 (302)
- 他把“神”变为人
——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312)
- “读好书、做好人”
——陈云的儿子陈元、女儿陈伟华 (316)
- 风雨搏击中的草原之子
——乌兰夫的儿子布赫 (320)
- 历史开的玩笑
——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 (331)
- 冷雨霜雪松且直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 (336)
- 噩梦醒来
——陈独秀的儿孙们 (349)
- 风雨人生
——李大钊的儿女们 (361)

- 秋之白华润芳华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369
- 从乞儿到院士
——彭湃的儿子彭士禄 (383)
- 归来的女儿
——邓发的女儿邓金娜 (394)
- 点点费思量 (400)

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与父母生离死别

毛岸英 1922 年 10 月 24 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毛岸青 1923 年 11 月 13 日出生于长沙东乡板仓，毛岸龙 1927 年 4 月 4 日出生于武汉。毛岸龙出生后第 8 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期毛泽东、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陈玉英住在武昌都府堤 41 号。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分共”叛变后，共产党人全部转入地下。8 月 7 日，毛泽东在汉口秘密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后第 5 天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动身赴长沙，准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此时杨开慧和陈玉英已带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先期回到长沙东乡板仓。毛泽东抵长沙次日，即往板仓看望妻儿，三四天后，由杨开慧相伴从板仓返回长沙城里。8 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岂料这次离别，竟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毛岸龙的永诀！

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后，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坚持地下斗争。保姆陈玉英仍同他们住在一起。1930 年秋，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长沙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

10 月下旬的一天，杨开慧在通知一位同志隐蔽起来时，被密探发现了。清乡队长带着特务班和 80 多个清乡队员包围了板仓大屋。

一阵紧急的打门声把开慧惊醒，她情知不妙，立即烧毁了身边的文件。火光映红她那张镇静、沉着的脸。

敌人涌了进来，要带走杨开慧。杨开慧从容不迫地收拾东西。当她刚穿上那件心爱的灰底红格子旗袍时，岸英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哭道：“妈妈，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当几个特务打手动手绑杨开慧时，岸英冲过去，一口咬住正在指挥的清乡队长的手。敌人恼羞成怒，一并抓走了年仅8岁的岸英和陈玉英。

在监狱中，敌人严刑逼供，妄想从开慧同志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动向和党的秘密，但都不能得逞。敌人又对岸英威吓诱骗，妄图从岸英嘴里打开缺口，岸英总是沉着应答。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严刑拷打开慧同志，有时还把岸英押在一旁看，从心灵上折磨他。每当妈妈受刑回来，岸英常常依偎在妈妈身边，用小手抚摸着妈妈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开慧同志总是强忍剧痛，对岸英进行革命教育，并让他记住这里的情况，将来告诉爸爸。

11月14日长沙城上空乌云密布，敌人杀害了开慧同志，而仍把岸英和陈玉英关在牢里。失去母亲的悲痛和非人的生活，岸英病倒了。经家乡亲友的努力，在开慧同志牺牲18天后，敌人才把岸英和陈玉英同志释放出狱。

从板仓到上海

毛岸英回到家里，见到外婆和两个弟弟。不久，保姆陈玉英离开了板仓，回到自己的老家宁乡。毛岸英三兄弟失去了母亲，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便在板仓同外婆杨老太太和母亲的伯母一起生活。

杨母带着毛岸英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岸英他们的外祖父杨昌济早已去世，家里经济拮据。长沙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

的安全。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知道后很不放心，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亲自写信要板仓的亲属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

三兄弟除了岸龙4岁，还不懂事，8岁的岸英和6岁的岸青都明白，这次去上海，是爸爸、叔叔的安排。他们舍不得外婆、舅舅等亲人，但又多么渴望早日见到自己的父亲呵。

当时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和李崇德在南京做事。1930年12月李崇德为年终结帐从南京回到板仓。接到毛泽民的信后，经家人商议，决定由李崇德护送毛氏三兄弟及杨母一起到上海。李崇德同杨母一起为孩子们准备了简单的行李物品。为了安全，他们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商定了孩子们对大人的称呼：不叫杨母外婆，而叫奶奶；不叫李崇德舅妈，而叫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李崇德、杨母带着三个孩子于1931年春节前由板仓启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毛岸英三兄弟，一直送到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登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到汉口后，李崇德通过杨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作过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到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途中度过的，春节后才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即按毛泽民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店和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面，谈了些情况后，毛泽民把杨母等人安排在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去后即向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当时决定将毛岸英兄弟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

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在地下党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1928年10月参加上海互济会工作。1929年底地下党组织为了解决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子弟的抚养问题，责成互济会在近期开办一个幼稚园。互济会负责人王弼将具体筹办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成立，并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杨殷等的子女，都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收养。岸英、岸青、岸龙，于1931年3月入幼稚园。

同年端午节(6月20日)前后，毛泽民、钱希钧要离开上海到苏区去，去前同岸英的外婆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毛家三兄弟。因为当时规定一般不让家属直接到幼稚园去看望孩子，所以只能趁孩子们出来游园的机会，同孩子们见面。外婆问了孩子们在幼稚园里生活的情况，毛岸英说，他们每天在园内念书，晚上兄弟三人睡在一起。毛岸英还讲了妈妈杨开慧怎么牺牲的情景。孩子们还问叔叔毛泽民，爸爸是否也在上海。

毛泽民等与毛岸英三兄弟在法国公园附近见面时，上海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约在同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由保育员把毛岸龙送到附近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紧口痢，经抢救医治无效当夜病亡。第二天，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了口棺材，将毛岸龙收殮。毛岸龙时年4岁。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董健吾返回上海后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即按地下党的指示，隐蔽起来，暂住在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度家里。

就在这时期，有一天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又名管荷

英)外出后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谭筱影和欧阳新怀疑有变,为幼稚园全体革命后代和家属的安全着想,经过反复考虑,于1932年春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园中的孩子全部遣散回家,有的家属来领,有的派人送回家里,有的不能送的临时寄养在可靠的或与党有关系的同志家里。当时欧阳新嘱咐在幼稚园当保育员的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寄养。

艰难的上海生涯

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郑兰芳及郑兰芳的母亲住在当时地下党在霞飞路的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半年左右之后,欧阳新提出让董健吾将岸英两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因为那里孩子多,好隐蔽,比较安全。

1932年8月,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修德里12号,开始同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及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生活在一起。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的年龄与毛岸英、毛岸青差不多,所以他们三个小孩子经常相处在一起。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时住下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及其子女们,说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黄慧光知道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孩子后,对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变换过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随黄慧光一家在修德里住了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安全起见,又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原胡希安的家,现为成都北路532弄3号)。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地下党干部浦

化人(董健吾入党介绍人,也曾一度当过牧师)经常到黄慧光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有时也教他们读书识字。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毛岸英、毛岸青又随黄慧光一家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在斯盛里住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两年左右。毛岸英、毛岸青出国就从这里走的。

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即到黄慧光家初期,仍由地下党组织按月提供生活费。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又屡遭敌人的破坏,因此,有一段时期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费供给。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转入地下,对黄慧光家的生活起初还管,后来也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时间也少了。当时黄慧光仅是一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两人一共七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困难的处境可想而知了。黄慧光为维护一家人生活,只好同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弥补生活费用。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毛岸英、毛岸青也干活,如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活等。所以在黄慧光家后期一段时期内,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他们吃得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尽管生活比较困苦,毛岸英、毛岸青在白色恐怖下总算度过来了。他们在董健吾家生活了四年多,一直到出国,中间没有离开过。

张学良的诺言

为了摆脱危险和困境,董健吾早有心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陕北毛泽东处,或转送出国,只是没有机会。

1936年4月,宋庆龄又请董健吾到西安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苏区,这就使得董健吾在西安时常被张学良邀

至家中吃饭、叙谈。有一次，董健吾得知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打坏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就通过在西安城里一个过去与上海松柏斋古玩店有交往的朋友，搞到一套24件名贵的明代涂釉彩瓷送给赵四小姐。张学良、赵四小姐见到这套古玩后，咄咄称奇，爱不释手，非以重金酬谢不可。董健吾对重金坚辞不收。张学良就问董健吾有什么事情要求帮助解决。董健吾实在拗不过张学良的诚意，便随口说出能否把他家里的三个孩子送到苏联去读书，张学良一听，当即表示这件事就包在他身上了。董健吾当时以为张是随便说说而已，在西安办完事后就返回上海了。

同年6月，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说他这次到上海来除有公事要办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酒店见面。董健吾接到这个电话，感到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于是立即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第二天，董健吾同刘仲华（当时是董健吾与地下党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前往见张学良。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秘密来沪，所以不便约他们在公寓见面。现有他的部下李杜将军（原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共产党员）要途经法国去苏联，乘机机会让他们带三个孩子出国赴苏。并说送三个孩子出国的一切费用他都准备好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后就匆忙与董健吾、刘仲华离开酒店，登上他的汽车，并由他亲自驾驶，送董健吾二人到复兴公园下车而别。

上海地下党经研究后，同意采用这个办法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苏联。冯雪峰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办。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

苏联。董健吾回来后，马上与李杜取得联系，随即和他女儿董惠芳一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他自己的孩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家里。宋庆龄也知道了这件事。

1936年6月，毛岸英随李杜一行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出发，航行约一月，抵达法国马赛港。毛岸英、毛岸青后由康生接到苏联莫斯科，随即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时年14岁多，毛岸青时年13岁多。

从留学生到红军政委

岸英从小就酷爱学习，在那风雨如磐的上海，岸英度过了五年多的艰难岁月，失去了进学校的机会。如今，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成绩优异。他俄语讲得流利，又学会了英、德、法语，中文水平也有提高。同时，他还写信给延安《新中华报》，介绍苏联的情况，并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苏联。

1941年6月，希特勒法西斯开始武装侵犯苏联，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战争破坏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儿童院的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也日益困难。岸英与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种蔬菜，到森林伐木劈柴。当德寇快要侵犯到莫斯科时，岸英他们被派到城郊挖反坦克战壕。他们每人只有一根钢钎和一把铁锹的简陋工具，天寒地冻，钢钎扎下去如同扎在钢板上一样。但他们从不叫苦，艰难地拿钢钎一下一下地往下扎，然后再用铁锹把土铲开。岸英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1942年秋的一天，苏联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来到依万诺沃市。岸英闻讯后，立即赶去找他，要求参军，上前线。经过长谈，这位负责人为岸英的决心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20岁的岸英很快进入了舒亚的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并入了党。毕业后，岸英又进入军政大学学习，获得中尉军衔。1944年夏天，他终于来

到炮火连天的战场，投身到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大反攻。作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解放波兰等国家的战斗。1944年底，斯大林接见了，表扬了他在红军中的贡献，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回延安

1946年1月，岸英回到了延安，别离了18个年头的父子终于相见了，这时岸英已经24岁了。岸英回国后，即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学习政治理论、进修中文。这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与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详细了解了岸英离别18年来的经历。听完岸英的叙述，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国外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你说好不好呢？岸英爽快地答应下：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上好劳动课。

1947年，岸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工作十分出色。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性的进攻和空前的大决战，毛主席、周恩来等离开陕北来到河北省西柏坡。岸英也来到了西柏坡。

同年夏天，在北方大学文学院读了半年书的、毛主席的干女儿、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放了暑假，因患疟疾，来到河北平山县治疗。病愈后，她到西柏坡去看望“干爸爸”。正巧，在毛主席处，碰上了岸英。听了岸英参加农村锻炼的经历介绍，刘思齐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她被分配同岸英一起去平山县参加土改。在工作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1949年10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读书的刘思齐同毛岸英举行了婚礼。